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

谢国桢

昔班孟坚有言，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故得书多，与汉朝等。至德周叔弢先生家世簪缨而恬淡寡欲，编摩典籍，沈博绝丽，为当世所称许。常抒其长才，经营实业，佐理市政，秩然有序。休沐之暇，仍不废佔俸，手不释卷，嗜书成性，有真知灼见之明，凡遇宋元佳槧名钞，不惜斥其财力而购之。寅夜校雠，专精宁一，而赋性泊淡，守约安常，此所以得享长年，即自庄严堪之谓也。

先生尝出其积年所得善本书目举以示桢，凡其庋藏之书，多铭心绝品，手自校勘，丹黄殆遍。所以考辨其是非，订证传本之谬误，以继黄、顾版本校勘之学为宗，而本古为今用之旨，传古信今，以津逮学林，用意至笃。桢以末学曾追随前辈长者之后，旋得聆公之教益，间亦嗜乙部杂家之书，喜闻月泉汐社之事，恒欲结撰成编，而订补有待。见公目录之中，若《东林十八高贤传》、《残明事迹备采》，以及《西洋番国志》诸书，皆桢所未覩者，以是知桢之鄙陋而公之沾惠后学者多已。

间尝以为版本之学，即为古笈留真之谱；清代学者洪稚存有言，以为版本之学有校讐、鉴别、赏鉴三家，公之于学，兼通目录，于校讐、赏鉴之事，兼而有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当亦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区域、时间，乃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

著，如《文心雕龙》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辨贗金源平水、宋蜀、浙、建昌版刻之区分；而辨析元明以来名家如藁竹堂、脉望馆、名宿钞本为尤难。公于鉴定佳槧、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兄曾语余云：“公为真懂书者”，此非楨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

夫版本之学，首当能获其祖本，然后加以校讎，一字之别，即有重于兼金，毫厘之差，有谬于千里者，然宋本亦有监本、家刻、书棚本之分，间有帝虎亥豕之误。如南宋蜀刻本《杜荀鹤集》有“大家怕手高声唱”，一望而知为“拍手”之误，不能因其微眚而遽没其大节也。先生之于收书，衡量最严，多取其上驷，如目中所载之《周礼注》十二卷，即为宋婺州家刻之善本，为聊城杨氏海源阁四经四史之室宋本四经之一。书之所以重祖本者，若经部之书，宋本注与疏分刻，自南宋以来，注与疏乃合刻，疏分隶于各章节之下，颇有删节，而弥失其真，此单注与单疏所谓正义本之可贵也。楨素昧于读经，故就史部言之，《史记》一书，在宋黄善夫本以前，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本自单行，自合刻本以后，正义颇多删节，如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有正义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注明三楚之意义，今本脱去此十六字，《史记正义》中如此例者，不胜枚举，见于邵晋涵《南江文钞》。此证明考据校勘之学为可尚也。由此进而言之，张菊生丈之校勘百衲本廿四史，至为矜慎，虽片语单辞，形音易舛者亦必究心。如《南齐书》本纪中，有“殷亡，口中血出”，“亡”“口”辗转误为“言”为“舌”。又《辽史》中“钓鱼”为辽主游畋之礼，今本作“钓鱼”，大失其真。获此孤证，幸存典章，此版本之学有裨益于治史，不可不明者也。昔赵斐云兄及楨为公进杨氏海源阁所藏《埤雅》，黄尧圃精校之本，黄氏又请高邮王念孙为之作长跋。又如尧翁获得旧钞本金刘祁《归潜志》，乃邀南浔施国祁至吴

门，为之校订，改“铜壶”为“铜壶”，校雠之勤，细如毫发。此书后刻于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中，遂成千古佳话。斐云兄谓余：书经顾黄诸君校定之后，如操左券，足以信今而启后。于是当时缙绅士夫笃于传古者，若石研斋秦氏为刻黄校《骆宾王集》，平津馆孙氏为刻顾校《续古文苑》，阳城张氏延顾润菴为校刻涂刊《盐铁论》；于是清代考据之风，大行于世，皆顾、黄诸家倡导之力也。

自明季以来，西学东渐，洎夫清雍、乾间严于野史之禁，有心之士，栗栗自危，乃于哲知之学，一变而为考证之法。取释氏因明之论，西哲形而上学之旨，用归纳演绎推论之法，使古代典籍散佚之书，为之爬梳整理，匡缪正讹，因之明白晓鬯，可以卒读。然为时既久，渐流于支离破碎之辞，戈戈识小之录，于是龚、魏之学出于旧学之中，而敷之以新义，发潜而彰幽，于清末内忧外患麇集，生民涂炭之时，足以唤醒国人，奋发有为，以为佐治之资，其功不可没也。

自顾黄诸家校理典籍，网罗散佚之后，至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军兴之际，时已相隔数十年，中经清兵镇压烧杀掳掠之后，时局不靖，书籍日就沦散。于是独山莫友芝游幕于江淮之间，搜辑散佚，俨然成聚，多有罕秘之本，惜不能守，后归于吴门顾紫大氏，藏诸怡园，秘不示人，今所盛传其孙顾鹤逸所藏之书是也。今先生距莫郎亭藏书之时，已近百年，时局动荡，逾于往昔。中经北洋军阀割据，依庇外力，操戈相哄，时局极为混乱。如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册典籍，沦为废纸，论斤斥卖。至于历代文物，佳槧名钞，则为奸商劫掠，鬻诸外国。如吴兴陆氏丽宋楼藏书，为日本三菱公司所得，建静嘉堂文库以蓄之。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亦朝夕不保，公乃竭其财力，凡有精刊名钞无不以善价得之；积腋成裘，蔚成巨制，晨钞露纂，精缮校雠，编成此目，举以献诸国家，其功不其伟欤？

楨生也晚，亦曾设砚于太液池旁，得读文津阁藏书，从徐森玉、赵斐云诸君学，旋又得识公及郑西谛先生。楨道出津门沪滨，辄与公及西谛相过从。西谛耽书如命，每遇异书，不惜典衣购之，势必得之而后快。旋于沪孺书肆上获尧圃旧藏孤本元明杂剧，脉望馆故物也。解放之夕，国民党政府汲汲不保，将古物书籍南迁，运至台湾，西谛在报端发表《古物何日归来》一文以警告之。自解放以来，党及政府重视爱护祖国文化书籍，西谛实司其责；乃与徐森玉、赵斐云诸先生筹策闢划，充实北京图书馆善本书藏，多方采访，私家供献，库中藏书得以无缺，然尚未能得千元、而宋惊心动魄之善本也。公乃以毕生精力所聚，宋元佳槧，明贤钞藏之书，举以献诸北京图书馆善本之室。于是金匱石室之藏，琳琅满目，焕然生辉，实为镇库之宝，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之奠基石也，其来日正长，如春华秋实，方兴未艾。森玉、斐云诸公固好事者，闻祁阳陈澄中所藏善本散在港澳，在周总理关怀下，乃不惜犖重金以购得之，其中所藏如钱牧斋绛云楼旧藏《前汉书》宋刻佳本，山阳丁氏旧藏北宋石经拓本，南宋蜀刻本之《张承吉集》，为海内外孤本，《张承吉集》近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之影印，以行于世。当时北京图书馆开展览会，邀余参观，时楨已脱离北京图书馆工作，调任科研之事，乃欣然应邀，得以阅读各书，古色盎然，至徘徊于展览棹前而不忍去。今西谛为国捐躯，森老、斐云相继而逝，为之腹痛。自十年浩劫以来，北京图书馆收进善本之书，阒然无闻，为之慨然。当此歼除四凶，建设四化，拨乱反正，百废俱举之时，北京图书馆为学林渊薮，众望所归之地，踵事增华，收进宝藏，固意中事，无待楨之喋喋，然不胜企予望之。

所可庆幸者，公年登九秩，彭寿可期，而楨贱齿已逾耄耄，童颜白发，时相过从，不吝一瓶之借，并举其所编善本书目嘱为之序。公以为朋友往还，老成多已凋谢，山阳闻笛之感，黄垆怀

旧之思，忆往开来，无逾于楨者。余乃沾笔吮毫，回溯往事，感知已之情深，忘老骥之伏枥，乃不辞下询，然感慨已深。因思公硕德耆年，而楨亦嗜书成癖，公以卓绝之识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而楨拾其纍馀，野史谰闻，不登大雅堂之书，而引以自喜，实则公摘其硕果，而楨拾其瓜蒂而已。因编成《瓜蒂龠野史笔记目》，将作芹献，以供学人之探讨，此则与公有同感者也，爰不忝而为之序。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即辛酉中秋节世晚安阳谢国楨谨识于春明寓庐之瓜蒂龠

杨树达日记已收全

已故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自1920年8月至1956年逝世前共有日记51册。1960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旧书店买得49册，收藏于该馆内善本阅览室，但缺第46、50两册，为美中之不足。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志为撰写杨树达传记，遍读有关资料，得知科学院图书馆缺藏之两册尚在杨氏亲属手中。借阅后，怀着合璧之情，建议杨氏家属将此两册捐献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便于社会科研利用，亦有利于杨氏文献手迹之长期保存。在这以前杨氏家属已有此计划，因分居各地，未能实现。这次经他们会商后，欣然同意，已于1983年12月正式捐献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方十分感谢，拟赠与一定报酬，但杨氏家属表示愿为国家的“四化”作出贡献，分文不取。杨氏家属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大家深受鼓舞，是值得学习的。

到目前为止，这部日记已收集齐全。其中所涉，正当杨氏学术盛年，多关师友朋弟往来，学问心得、研讨探索，以及同辈学人轶事、月旦评议，堪可构成民国学术史之一角。

崔 白